

文史资料选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二十八辑

- 和鲁迅先生往来的几点印象 金 丁
和陶行知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汪刃锋
记林白水 张次溪
杨刚二三事 赵萝蕤
与张篁溪张次溪父子书 齐白石
我和胡适的交往 贺 麟

北京出版社

K291.6-13 65522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出版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Wenshi Ziliao Xuanbian

第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96,000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50

书号: 11071-489

定价: 1.65元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八辑 目 录

和鲁迅先生来往的几点印象	金 丁 (1)
鲁迅先生对我的教诲	李遇安 (13)
山本医院和鲁迅	胡瑞峰 (17)
广化寺和鲁迅	胡瑞峰 (18)
和陶行知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汪刃锋 (19)
旁听陶行知先生主持的武训纪念会追记	王立平 (32)
记林白水	张次溪 遗稿 (34)
关于邵飘萍、林白水追悼会的回忆	林慰君 (48)
目睹林白水就义	唐振宇 (51)
忆父亲路友于烈士	路端谊 (52)
忆宣侠父烈士	郝宇新 (65)
杨刚二三事	赵萝蕤 (72)
一个老同盟会员走过的道路 ——回忆父亲谭熙鸿	谭伯鲁 谭幼懿 (75)

DK 65/07

记参与彭家珍炸良弼案的同盟会员王崇义

.....胡玉树(89)

回忆周总理对先祖父齐白石的关怀

.....齐佛来(94)

回忆白石老人.....张次溪 遗稿(101)

与张篁溪、张次溪父子书.....齐白石(139)

附：读《与张篁溪、张次溪父子书》后.....叶祖孚(154)

向白石老人学画的日子.....熊仲光(158)

我和胡适的交往.....贺麟(164)

他为祖国的卫生事业贡献了一生

——忆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先生.....杜孝贤(171)

忠实于人民的文化战士

——忆父亲方白.....晓青 晓钟(182)

怀念郑野夫.....唐河(208)

有关史量才先生史料的补充.....朱迈沧(212)

记解放前平津地区的风云人物许惠东

.....许兆林(218)

徐树铮之死.....陈芳芝(239)

饲养金鱼六十年	徐金生 (241)
北京的花木业	李紫宸 (253)

读者来信

关于《未名湖畔的风云》一文的补充	荣国浚 (260)
对《忆大革命时期的两位烈士》一文的补正	肖保晋 (264)
对《从“兴华门”到“和平门”》一文的我见	苏亚民 (265)
徐世昌不可能做过笔帖式	陆 敬 (267)
十七世纪的阿拉巴金是中国领土	陆 敬 (268)

和鲁迅先生来往的几点印象

金 丁

我和鲁迅先生的来往不多，但有些印象，至今难忘，现择其要者追记如下。

（一）

一九三二年春，徐盈、替焚（即师陀）和我，在北平办了个文艺刊物，名曰《尖锐》。刊物是十六开本，每期十六页，封面是由当时北平艺专毕业的芦沧同志画的，画了个工人掌握着方向盘，轮子在旋转，非常惹人注意。看来我们也颇自命不凡，以推进历史车轮为己任。不过销路不错，本钱也可以收回，因而不免高兴而得意。接着出了第二期，同时也把这刊物寄到上海去。除寄给《文艺新闻》和丁玲同志外，给鲁迅先生也寄了两本，请他批评指正。但《尖锐》出到第三期就被禁了。一天徐盈带着一本《文学月报》来，说：“你看看吧。”我把署名J. K的那篇《再论翻译》——答鲁迅的信，从头看完。J. K是瞿秋白同志的笔名。没想到文中涉及到《尖锐》和我那篇写天桥飞行集会的小说。文曰：“现在不但翻译，甚至一般欧化文艺和所谓语体文，都有这种病根：……不但不能够帮助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发展，反而造成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话，半文不白的文言文。……譬如说

吧，新近有一位金丁，我看过他的一篇小说《孩子们》，这篇小说在文字语言上说起来，的确可以算得是好的，总之，这篇小说证明他并不是不会写真正的白话文，但是我看见他另外一篇‘创作’（《尖锐》杂志）却大不相同了。”在引用了我小说原文中的一段之后，他指出：“你看，这里的许多字眼：‘伴同着’、‘喧嚣’、‘隅角’、‘没有起色’、‘若干人们’、‘流’……都是口头的白话文字典里不会有的字眼，或者是意思用错的”，“这是五四式的林琴南主义，这种新式的林琴南主义现在风行得很。而金丁，能够写真正的白话，却偏要扭扭捏捏的，这尤其是不可宽恕的罪恶，我说‘罪恶’这决不是过分的。”①

读完这段批评，我心情很沉重，这一击猛掌确实打到痛处。但我想，这信一定是经鲁迅先生同意，然后发表的，因此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过于“严厉”，特别是对青年。当时完全忘记了真的得到了“批评、指正”应当感到多么的宝贵。

这年夏天，我避居慈溪会馆，重新读着鲁迅先生的《坟》的后记。文中先生讲到他自己是如何从“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而逐渐认识到“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的经历和体会。这对我的启发甚大，使我看清了自己的毛病所在。过去，我因多看了些翻译作品，不免受其影响，虽想在自己写作时也创造些新的字眼和新的句法，结果却“糟蹋”了新的表现法，使写出来的文字非常欧化，成了“死的语言”。

我也再读了秋白同志题为《关于翻译》的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信里说：“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

① 见《瞿秋白文集》第三卷。

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样？”我没有想到秋白同志对《毁灭》中的译文甚至举例提出了九条“更正确些”的译法，那要比对我的小说的批评严格得多，“尖锐”得多；而我当时因年轻而狂妄，又怕丢丑，却对鲁迅先生产生了不应有的印象。

五十多年过去了，重新回忆这段往事，真是感想万千，我们多么需要有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和批评的同志啊。

（二）

我第一次在什么时候看到鲁迅先生，现在已经记不确切了。大约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间。一天下午我去内山书店把徐盈寄来的先生在北平几次讲演的照片送给先生。先生看了照片后很高兴。他问此照片是否可以拿去发表，并说让雪峰同志去办吧。于是他又谈起了他在北大、辅仁、女子文理学院和师大讲演的一些情况。他说第二次在辅仁讲时，想不到听的人竟达千人以上。在师大讲的时候，就更多了。不过，他说讲演的内容报上登载出来的有很多错误。有的是故意歪曲甚至是攻击他的。接着他说起北平有些人说他是“卷土重来”，他说我已声明：我不久将“卷土重去”。先生又问我是否认识王志之同志。我说彼此通过信，因为他们想办一个大型的《文学杂志》，希望上海有人写稿。我当时在“左联”创作委员会，因此手边有些同志写好的稿子。先生说：应当支持他们。我问是不是可以把张天翼的那篇《自传》先寄去？先生说：“我看可以吧。”在内山书店同先生的这一次会

面，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同他谈话可以毫无拘束，并不象我以前所想的那么“严厉”。

不久，在施蛰存先生主编的《现代》杂志上，照片果然刊出了。《现代》每期都有几张画页。不过解放后在鲁迅博物馆的一次预展中，我看到关于北平讲演的照片只剩下在师大操场上的一张，《鲁迅全集》上也同样只有这一张。我问过李何林同志，他也不甚了解。又问起徐盈同志，到底是谁照的，想再找找这些照片，他也记不清了。去年王志之同志和蒋锡金同志光临舍下，我因外出开会失迎，所以仍不知道关于这些照片的究竟。鲁迅先生曾说起他要志之同志替他把登载在北平报上的演讲稿搜集一下。可惜五次演讲除见之于《集外集拾遗》的两篇之外，其余皆未留存，至于对立面的东西就更没有了。我想如果现代文学馆能把先生这次在北平演讲的详细而真实的情况印一本书，那将是一部宝贵的文献。

(三)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初，“左联”开过一次新的执委会。上午开会的地点是在南京路后面的一所教堂里，现在从国际饭店楼上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旧址。在什么地点开会，预先不曾通知，是临时由华蒂同志带我去的。“左联”当时有“第二党”之称，纪律很严，开会事先保密。鲁迅、茅盾、丁玲、周起应（周扬）和楼适夷以及组织部长华蒂（叶以群）、宣传部长彭莲清（彭慧）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李辉英和我是新当选的执委。谷非（胡风）因当时尚在日本，未能出席。我记得雪峰同志先讲话，他建议祝

贺茅盾同志的《子夜》出版。大家纷纷起立，没有酒，举起茶杯表示敬意。接着是请鲁迅先生讲话。他的话不长，但着重谈了培养新作家的重要意义，说：我们的阵线是必须扩大的，因而要更加注意发现青年作者，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做得不多。他认为不够成熟的作品也是作品，不容忽视。

鲁迅先生这次讲的内容，使我深受启发。当时我在两家中学教书。“左联”有个外围组织，简称“文研”（即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成员以在学校爱好文学的学生为多。有些参加“文研”的同志后来就参加了“左联”。吸收到“文研”的成员，除政治条件外，还要看他是否在写作上有一定水平。记得上海泉漳中学参加“文研”的同学比较多，他们很希望有更多作家经常同他们接近，帮助他们。教师中就有几位“左联”成员。记得有一次请胡楣同志（关露）去讲演，效果很好，连不是“文研”的同学也有不少人去听讲，对开展工作很有利。“文研”有些同学很会写东西，我特别注意高二有个叫许道琦的同学，在完成应交的作业以外，有时也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我看。有一次他把一篇散文交给我，希望能替他改改。我看后觉得完全可以拿到杂志上发表，问他是不是寄给鲁迅或丁玲，他觉得他们不会看一个学生随便写的东西。我告诉他，他们会看的。这事说完也就过去了。有一天许道琦忽然接到了丁玲的回信，他非常高兴，拿了信给我看。后来学校被封闭，但他却参加了“左联”。上海文化中学，有个叫郑玉璠（郑育之）的同学，也会写文章，后来也参加了“左联”。总之，做教师有个有利条件，容易接近学生。十年内乱中，造反派外调时，问我许道琦每次到北京来同我谈了些什么？

（道琦当时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现为湖北省委顾问委员会主

任。)我回答说,我不认识许道琦。他们发了火,说他是泉州中学的学生,参加过“左联”,你为什么不认识?我说我当时教的学生确实不少,不过有些人也记不清了,“左联”的人,我也有很多人认识。总之是蒙混过去了。我从干校回来后,道琦同志曾来京看我,谈起往事,不禁感慨万千,他说自己要过多年的笔杆是同过去爱好文学分不开的。

最近读《作家通讯》,有个题目是《同会员更靠近一些》,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有些相熟的作家,是不是也有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不通音信的?我以为,对于不相识的爱好文学的青年,应主动去接近他们。我们现在的环境比起三十年代不知好多少倍,不过有的同志也许是由于年长力不从心了吧?

(四)

一九三三年春节前后,冯定同志(笔名贝叶,当时我们叫他季定)到北四川路我的住处找我,说有个好消息:他在北平译的那本以描写海军生活为题材的苏联小说,开明书店总算答应可以出版了。不过有个条件,要请鲁迅先生写篇序文。他希望我把稿子拿给先生,请先生看后写几句。我欣然答应了。

冯定同志是一九三二年秋和我一起从北平到上海的。他要到上海接组织关系,暂时寄住在堂兄家。他当时很穷,有时就从霞飞路一家叫Fleats的书店里买点苏联报纸杂志,译几篇短文,要我替他拿到杂志上换点稿费,当然所得甚微,而且有些在我们自己的刊物如《世界文化》发表后也拿不到稿费。因此,如果这本苏联小说能出版,至少可以先预支一点发表费,也算不无小补吧。

我把译稿送给鲁迅先生。先生说，大约半个月左右可以看完，到时候可去内山书店找他。

过了两星期左右，我去看鲁迅先生。他说贝叶的译文看过了，内容不错。不过他对海军生活了解得有限，是不是请贝叶把作者的小传能译出来，那样他写点前言之类就顺当多了。

我把上面谈话的经过告诉了冯定同志。他说从苏联回国时，是在路上空闲中看的原著，原文是在一本杂志上发表的，并没有作者的小传，他对这个作者也不了解。我问那我怎样去回答鲁迅先生呢？冯定感叹地向我摇了摇头：“说穿了，书店完全是从营业的观点出发，不过是想借用鲁迅的名气而已，只要他肯写几句，那怕是很短地写几句，介绍出这本书的人也算能够有所交代了。”

于是我再去鲁迅，谈到发表原文的杂志中并无作者的小传。而贝叶对作者又一无所知，为了争取出书，是否还是请他就内容写点意见。他看来有些为难。我当时感到非常着急，就说：“无论如何，您务必写几句，他们书店没有您的序就不肯出书了。”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先生听了后，很久没再说什么。最后，说：“那再说吧。”看来，我的话可能使他不悦。

三月下旬，我因“上反”（上海反帝大同盟）调我到沪东区工作，忙于找房子、搬家，也没有再去催问先生。大约四月初，我忽然接到先生托人带给我的信，译稿也同时退回。信中大意是说，关于序言，他曾想过，决定还是不写，对于商人，是大可不必曲意逢迎的。

我把鲁迅先生的信给冯定同志看，深感先生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妥协的。“鲁迅先生的骨头是硬的”，也可以从这件具体的事

情上反映出来。

后来，又一次遇到鲁迅先生，我们都未再提贝叶那本译文的事。他只是谈到“左联”想办杂志的问题，和什么人开过会，一时尚无结果等等。

（五）

一九三三年七月底或八月初，我从上海公安局被押解到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监。在那里遇到了艾芜。他正在闷热的牢房里写小说，说是除邮费外，只消给看守两角小洋，他就可以代寄“私”信，次日还可以拿到挂号的收条。

对于在上海公安局我所身受、目睹和耳闻的特务的法西斯暴行，我认为有尽快揭露之必要。于是我就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写完小说《两种人》，笔名用的是金丁。

稿子写完了，寄到什么杂志去发表，颇费踌躇。我抄写了两份，一篇寄上海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里有互济会的同志），请他们转交我的爱人，由她送到《现代》杂志编辑部，我并附了封信；另一篇寄给鲁迅先生，我告诉他我同时也寄给《现代》一份，不过我毫无把握他们是否肯发表我的作品。我被捕前曾有篇小说，连同艾思奇同志写的《身边琐事与伟大远景》一并送给《文学》杂志的傅京华先生，原来说是要发表的，大概因为知道我已被捕，稿子既不发表，也未见退回（艾思奇的那篇，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才在他自己编的《认识》月刊上发表）。所以我很担心寄给《现代》会不会碰钉子？我希望鲁迅先生能够替我想想办法。不久，《两种人》在一九三三年十月的《现代》杂志上发

表了。我很高兴。按时间说，从我寄出到发表不到一个半月，是很快的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说鲁迅先生把这期的《现代》曾寄给在莫斯科的萧三同志。

事过三十四年之后，有两位大学毕业生带着介绍信来找我，他们是为《鲁迅书信集》做注释的，说是鲁迅先生有封信里提到我，有两个问题，他们弄不懂：一、参加“左联”的作家是否都是党员？如果有的不是，那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他们？二、鲁迅说的“白化”是什么意思？他们只听过有“赤化”之说。

我向他们要了鲁迅先生的那封信，原来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寄给萧三同志的，信里说到寄出杂志及书籍共二包，《现代》和《文学》都是各派的来稿都收的，其中也提到金丁是我们这一边的。看来鲁迅寄书给萧三的事是确实的。

因此，总的说来，我感到鲁迅先生对青年作者，一贯是爱护的，但要求也很严格。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迁就的。我和鲁迅先生的来往，虽然不多，但所受的教益却是宝贵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作者附记：

一九三七年九月，我已回到上海，在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戴平万和林淡秋同志找我商谈，说是想以上海文艺界战时工作团的名义，召开一次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并请郭沫若和田汉等同志讲演。开会那天参加的人很踊跃，多是学生和工人。

郭沫若同志说：他虽然过去和鲁迅先生在文坛上有过争论，

但却从未见过面。接着他借用有人歌颂孔子的话：“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没有孔子，孔子以后，没有孔子。”高度评价鲁迅说：“鲁迅鲁迅，大哉鲁迅，鲁迅以前，没有鲁迅，鲁迅以后，无数鲁迅。”（群众热烈鼓掌）他又解释说：鲁迅的战斗精神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坚持到底，死不妥协”。现在前线战斗的士兵和后方的广大群众，不都在继承发扬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吗？所以说现在我们有无数鲁迅。

大约过了两三天，上海文化界又聚会纪念鲁迅先生，会由沈衡老主持。郭沫若同志又讲了话，他开宗明义地说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鲁迅，没有人能做出鲁迅那样巨大的贡献。他说，他自己也只是做过一些打油诗。又说：在座的有小说家、诗人、文学史家、评论家、翻译家、木刻家……，而鲁迅，不但是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而且是诗人，提倡版画、戏剧，他的杂文更是无人与之相比。可以说，只有大家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鲁迅。因此我们文化界的朋友，必须加强团结。

一次是“无数鲁迅”，一次是“没有一个人是鲁迅”，但开会的场合不同，要求、用意也不同，他的话是不矛盾的。因上述情况，很少有人记载，特附记如上。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

施蛰存和金丁答编者问的通信摘录

金丁同志在《和鲁迅先生来往的几点印象》一文中提到，现

在我们见到的鲁迅在北平讲演的照片只有师大广场那一张，但他当年送交鲁迅先生后由雪峰同志办理的照片却不只一张。就此问题，我们问了徐盈同志，因照片是由他寄给金丁的，但他现已记不得寄出照片的数日。我们遂写信问施蛰存同志。施老正在病中，他回信说：

“惠信及附件收到。关于鲁迅在北京演讲的照片事，我已不很记得。今见金丁同志文才想起来。金丁同志的记述没错，但当时我不知道这照片的来历，雪峰也只送来一张，我就发表在《现代》上。请问一下金丁同志，他当时送了几张照片去给鲁迅？”

我们又去问金丁同志。金丁同志来信说：

“读到您引述施蛰存同志信中的话，感慨很多。友谊是可贵的。前年在《新文学史料》上曾提及《两种人》的事，当时本想向他写信问候，后来又听说他已入院，信不知寄往何处，于是一直延误至今。我记得冯定的那本译稿就是鲁迅先生寄给施公退转我的。因当时我从北四川路住处调到沪东区工作，迅翁一时无法通知我。但这里也可看到‘左联’同《现代》的关系及施公的负责精神。天翼、沙汀、艾芜是经常在《现代》发表小说的。”

金丁同志这段话说到“左联”和《现代》杂志的关系，涉及